

不可遏止的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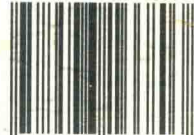
陈晓明 著

黄山书社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

学术顾问 钱中文 主编 吴子林

ISBN 978-7-5461-6680-3



9 787546 166803 >

定价: 69.80 元

不可遏止的变革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

陈晓明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遏止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陈晓明著.—合肥:黄山书社,2017.8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吴子林主编)

ISBN 978-7-5461-6680-3

I.①不… II.①陈…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2381号

不可遏止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

BUKE EZHI DE BIANGE—20 SHIJI 90NIANDAI ZHONGGUO WENXUE DE ZHUANXING

陈晓明 著

策 划 汤吟菲 朱莉莉

责任编辑 朱莉莉 郑 程

责任印制 李 磊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400千

印 张 20.25

书 号 ISBN 978-7-5461-6680-3

定 价 69.80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陈晓明

1959年生，福建光泽县人，文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2016年9月起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1993，2015）《德里达的底线》（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2015）《无法终结的现代性》（2018）等30多部著作。

醒 福 典 批 评

|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 |

学术顾问 钱中文 | 主编 吴子林

总 序

通读眼前的八部书稿,各种情绪:兴奋、激动、享受、叹息、伤感、寂寥……轮番袭来,纠结于心。这时,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音乐家科伦布的爱妻亡故,他从此带着两个女儿隐居深林,整日独自研习古大提琴。在绵延无休的乐声中,他看见深爱的亡妻,此刻就坐在他对面聆听。之后,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乘坐马车,一起并肩走过春色茂密的森林,一起来到河岸渡口,直到她独自坐上小船离去。怕她再次消失,他不忍停下手中的乐曲。为了让她一遍一遍重现,他用余生不断拉奏心爱的大提琴,记下心里的悲伤乐曲,想看看爱将延续到哪里。

这是一个清静的世界。老房子旧得幽静、坦然,乐声绵延无休、难以捉摸,家中的器皿也都散发出乐器的光泽。科伦布在森林里拉琴、作曲,他拒绝宫廷表演的邀请,拒绝各种矫饰,只为灵感而作曲,只是记下瞬间的颤抖,删除多余的抒情。他的演奏闻名遐迩,在传说中更是出神入化。

有一天,17岁的红衣少年,一个鞋匠的儿子,敲响了音乐家的门。他立志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慕名前来

学艺,几经周折,红衣少年成了科伦布的学生。后来,红衣少年背着老师受聘为皇家乐队的演奏家,而被逐出师门。再后来,红衣少年成了宫廷乐长,生活富足;音乐给他带来了华丽的马车、镶嵌珠宝的假发衣饰、显贵的地位与指挥权杖,但他不再有17岁时那湛蓝的眼神。他深感自己始终未得音乐的要领。他记得,年少的那个午后,在森林里听到的琴曲,那种庄重、静穆、悠远而哀伤的,才是真正的音乐。

老人弥留之际,宫廷乐长深夜赶赴森林小屋,去上最后一堂音乐课。当他一身显阔地走进那简朴肃穆的家中,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臃肿的丑角。他问老人:“音乐是什么?为了供奉上帝?为了取悦国王?为了金钱?为了荣誉?是爱情的忧伤?或是自暴自弃的放纵?”

都不是。

他终于领悟,自己的疑问便是答案:“是不是给死者的礼物?是给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低声的安慰,给那些消逝了的童年?是为了让鞋匠的锤声变得柔和?是为了那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过的时间,在我们呼吸之前,或者看见光亮之前……”

——这是电影《尘世里的每一个清晨》所讲述的三百多年前的故事,它把我们带回到音乐的黄金时代,唤醒了许多温馨美好的记忆。

是的,倘若音乐有魂魄的话,那就是它的毫无用处,它的无用之用。音乐是爱,是恩慈,是虔诚,是内心孤独的吟唱,是出神的一瞬,是人类关

于光明、自由和宁静的力量的梦想。

“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存在的浅层部分;为了了解其内在的生命——其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他的文学、哲学,以及艺术这些反映该民族理念、情感和梦想的东西,来深入探索它的灵魂。”罗曼·罗兰写道,“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①

文学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一样,都是一种生气灌注、深邃博大的“创世”,也就是发现、创造可能世界,帮助人们建立生命的、家族的、民族的“根”的意识,确立经验的、文化的统一感与连续性,在滋养自身的同时,影响人类的精神世界。

安贝托·艾柯在《诺伯托·博比奥:重新审视博学之士的命运》一文中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解决”危机,而在“制造”危机,即时刻营造出一种危机感,唤起人类的共同意识的危机感,并寻找、创造普遍的社会共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进入“新时期”以来,整个国家处在一种社会转型之中。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崭新形态的文艺理论,成了文艺学界的重要课题。面对当代西方文化传入所引发的诸多挑战,以及当代文学创作所提出的诸多命题,经一大批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终于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即“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②。文艺学研究的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如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解释学、中西比较诗学、文艺生态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人类学、文化诗学等领域,都有人在尝试,并获得了不少结实的成果。

① [法]罗曼·罗兰著:《音乐散文集》,冷杉、代红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7页。

② 童庆炳撰:《新时期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概说》,《童庆炳文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8页。

值得强调的是,其中的一些杰出的代表,如钱中文、童庆炳、孙绍振等文艺理论家,他们大多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从没脱离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实。置身于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怀抱笃定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广泛关注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对现有的种种结构模式始终保持质疑的态度,并通过精深的研究推翻僵化不合理的部分,表现出了对时代命脉的精确诊断和敏锐切入。由于洞察了语言符号背后的价值世界,他们成功揭示了其中丰沛而深厚的精神质地,呈现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想象,开启了一个个一般人所未曾领悟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是显示人文知识分子存在身份的根据,体现了对社会应履行的责任。

至于当下学界的中坚力量,如高建平、王岳川、李春青、陈晓明等一批学者,则是这些前贤的薪火相传者。与师长辈学者一样,对于他们而言,个人与历史、个人与国家互为镜像;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及准则,善于提取、想象、弘扬历史与现实中稀薄而弥足珍贵的东西,并以其充沛的语言敞开、释放灵魂的悸动、精神的能量,以内在心灵的秩序对抗外部庸众的世界。

在我看来,文艺理论、美学的研究者以及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倾听者、质疑者和审判员,都是在为一个“缺席的民族”而写作,而不是做历史的书写者、抄写者和打字员。

名利诱惑与学术追求,对于所有问学者来说,是人生中不断出现的十字路口。文学艺术和生命宛若一条河流,收集了星光、烈日、蓝天、雾霾、彩虹和暴雨。面对欲望与生命力蠢动的世界,真正的学者以学术为宗教、为信仰为志业,他们洞察哪些是浮云,哪些是本质;他们所能看到的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他们播撒怀疑的种子,而不是收成已然明确的事实;他们不只是理念的唤醒者,同时还是社会革新进程的引导者;他们知道,生命只能燃烧,不可虚耗——因为他们手头所持有之物,不外乎时间、记忆和文学艺术所创造的美;而理论的勃勃生机,只能源于抵御纷扰人生的各

种诱惑或压力,源于创造性的质疑、心无旁骛的虔诚劳作和漫长执着的自我探寻。只有在思考和写作中,每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皈依之所——这是上述优秀学者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由钱中文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本人主编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本着“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宗旨,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以检阅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实绩。本丛书具有开放结构,第一辑推出的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批评家,其中既有年逾八旬的资深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作,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

主编这套丛书的愿望有二:

其一,展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所取得的实绩,凸显那些富于中国特色的、有个性、有识见、敢论断、敢担当的学术创见。如,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孙绍振的“文学文本解读学”,高建平、王岳川之于中西美学的剖析,李春青之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建构性清理,以及陈晓明、吴子林之于中国“文学问题”的探究等等。

有识之士指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跟它是否拥有富于价值的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就是有一个或一批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他或他们代表这个城市、国家,这个城市、国家也进入了这一个或一批伟大作家、思想家的创作生命。简言之,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的塑造,其义大焉。

毫无疑问,包括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在内的学术本身,是中国当代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系统地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塑形中国的“大国形象”,至关重要。为此,在推出本丛书的同时,我们还将努力组织专家将它们译成外文,使它们走向国门,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宏愿,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认识

中国——这是颇有文化远见的举措，在一切追求市场效应的今天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二，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希冀后来者能赓续前人纯正的学术品格，全副身心投入到文学这一健康的终生事业中去，以扭转目前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的窘境或困境，切实推进现实社会的改善与进步，使人们重获生命的完满，走出一条焕发生命韵致与光泽的道路。

马克思有句格言：“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①通读完八部书稿，只觉时光如电，一股氤氲之气回荡其间。偶尔抬眼远望，只见雾霾重重，晨昏不明，仿佛自己悬浮于另一个世界；一阵北风骤起，雾霾一点一点散去，古老的都城一点一点透明起来，一点一点安详、生动起来。

户外，市声隐隐沸动，如深山松涛；窗外，落叶敲打着落叶，雨点追逐着雨点；远方，迷迷蒙蒙，器嘈不舍昼夜——我听到了生活行进的坚实步履……

一切都只是开端。“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还将推出第二辑、第三辑……并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是为序。

吴子林

2016年12月23日

^① [德]马克思撰：《致R》（1843年5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8页。

再版自序

本书对 90 年代初的文学现象进行概括和阐释，试图揭示那个时期文学发生的深刻变异。在我们通常的表述中，90 年代初是中国文学和文化转型的时期，但这样转型在文学上的表现如何？其深刻的内在本质如何理解？学界对此的论述并不多见。这不只是在于这一变异多么复杂，而在于表述的困难。思想的洞察力的有限以及语言的贫困都使表述难以直接和彻底。本书显然不自量力，尝试进入复杂的历史语境，虽然不能左右逢源，但试图找到一条路径，为 90 年代初的文学与文化的变异提示一份历史草图。

本书完成书于 1995 年，出版于 1997 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原书名《剩余的想象》，距今有 23 年之久。何以在我耳顺之年还要再版呢？说起来这本书交稿后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等我 2016 年底回国，再敦促出版社出版。那年月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当然是要感谢当时华艺出版社负责人金丽红女士和黎波先生，他们慷慨支持，这部书才能顺利出版。90 年代中期，学术著作出版发行都十分困窘，这本书出版后，发行量有限。或许也是因为华艺出版社并不长于学术书籍的推广，本书传播量想去很不充分。很长时期，我对这本书出版发行未尽人意，颇感遗憾。数年前友人夏可君兄特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到他那段时间读到拙作《剩余的想象》，尤其对我以“剩余”来概括 90 年代初的文学和文化的时代特质，心有戚戚焉，深有同感。可

君兄是我敬佩的青年学者，他在这本书出版多年之后还在读，也让我心存感念。既然还有同行朋友会拿起来读读，拙著或许还有一二是处，这也是触动我修订再版的原因之一。

因本书有删削，加上二十多年之后，语境变化较大，故有些说法也按现在的言说习惯和行文要求做了一些调整，但架构和主导意思没有改变。

本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有限，且这本书打上二十多年前的印记，这并非一句“时代局限”所致所能开脱；恰恰相反，那时可能因为年轻，意气用事，言说的环境也是与杂语喧哗的时代相称，说话自然放得开。如今已经是耳顺之年，老气横秋，会对有些说法有所反省，收敛许多在所难免。但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一种气度和气氛，一种气息和风格，我也最大可能尊重历史，不忘初心，保持本书的原貌。虽无力为历史存照，但有心为历史留念。

不当之处，欢迎学界同行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是以为再版自序。

陈晓明

2019 年 11 月 8 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版自序

捕捉那些处于边缘性的、朦胧而暧昧状态的文学现实，解读其中隐藏的非常规意义，这是我持续不断的职业爱好。我知道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然而，我的天性、我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使我别无选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埋头于《无边的挑战》一书的写作，那时我的工作受到多方质疑。师友们对我不厌其烦地谈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表示大惑不解。那本书的出版延搁了多年之久，后来等我的书出版时，当年的无名之辈已经蜚声文坛。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或者以韬晦之计用心良苦，我只是想表明这是出自我的职业习惯。

攻讦和辩解是我最为厌恶的学术活动方式，坦率地说，我崇尚从容启示式的读解，阐释、拆解、发掘那些人所未知的要素，对谜一般的真相进行追踪，这种工作会让我快乐，这就是这项职业给我的最大诱惑。我承认我的职业遇到危机，这并不仅仅来自个人生存的危机，这是一种文化的危机。

先锋派是当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最后景观，随后的创造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托，能提供真

实的抵御历史压力的场所。这使我所关注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边缘文学将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潮流。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个人化的结果，也就表明了它的边缘化。很多人在写作，以各自的方式，以不同的效果，勉为其难地去制作这个时代的文学奇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文学的常规生态。

常态也有它的美感，它是历史所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结果。确实，人们现在对文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不满，这种责难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关于文学的古老梦想。在这个视听符号帝国急速扩张的时代，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说文学有什么过错的话，如果说文学真的不行的话，那不是因为它用尽了自己的力气，而是它步入常态。这并不表明我就是现存文学的辩护者，这是我们理解现时代文学必要的前提，否则，我们这些文学的末路人只有长歌当哭，还有什么必要花费精力去指出什么不足？文学在这个时代不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它退到了社会的一隅，做它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用语言书写符号给人们提供一个想象性的替代空间。即便如此，“想象性的替代空间”也是一个有必要加以限制的概念，乌托邦也是一个想象性的替代空间，因而我使用了“剩余的想象”这种说法。它不再是那种宏伟的叙事，不再是那种与历史具有共同起源性的元叙事。它就是植根于个人记忆的一种有限的想象情境。

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就难以形成实际的持久的中心，也不会有真实的历史潮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潮流注定了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学潮流都是虚假的，而是说，与过去的文学那种宏大的元叙事不同——它是历史情势表达出来的历史实际的要求，那种意识形态实践植根于历史的实在之物；而现在，意识形态其实已经常规化——也就是说它的那种绝对而持久的精神支配力量实际已经不存在了，只是相当多的人还怀有对意识形态的信赖，因而意识形态的生产还很活跃，但那都是具有未来性的历史所指的能指。从现实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精神幻想已经被更为务实的“生活需要”所替代。在这一意义上，九十年代的文学也不会像新时期文学那样怀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创造一系列的历史愿望，文学上的各种派别、主义和旗号都与时代的总体要求密切相关。而九十年代，只有纯粹的文学要求，只有理论自身的推论实践，只有基于对贫乏的恐惧和对平庸的逃避而制造的各种理论现场和文学奇观。在某种意义上，九十年代创造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新……”（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都市、新乡土等）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后”的拒斥，或是因办刊物的黔驴技穷而打出的招牌，在它那蛊惑人心的困窘姿态底下，也包藏着对平庸时代的逃避与躲闪——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文学在视听符号帝国里，在后工业化时代对人的想象力不断缩减的历史前提下所做出的负隅顽抗。大多数人只看到它的卑劣和无能。然而，我却看到它的可爱和天真，看到它奋起搏击的后悲剧精神。制造出某种潮流，这种自欺欺人的文化奇景，也许是文学在这个时代保持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的特殊方式，也是剩余的想象力给予人仅有的创造力。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对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的文学现象做出我的阐释。基于我的理论视野，我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后新时期”。在八十年代末期，我写作的多篇文章中反复使用了“新时期后期”这种说法。1992年5月，我写下一篇题为《新时期的终结》的文